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蓝色东欧
第3辑

十亿个流浪汉，或者虚无

托马斯·萨拉蒙诗选

[文尼亚] 托马斯·萨拉蒙 / 著

高兴 /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Tomaz Salamun

十亿个流浪汉，或者虚无

托马斯·萨拉蒙诗选

Tomaz Salamun

[斯洛文尼亚] 托马斯·萨拉蒙 / 著

高兴 /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亿个流浪汉, 或者虚无: 托马斯·萨拉蒙诗选 /
(斯洛文) 萨拉蒙著; 高兴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 4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3辑)

ISBN 978-7-5360-6927-5

I. ①十… II. ①萨… ②高… III. ①诗集—斯洛文
尼亚—现代 IV. ①I555.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1775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3-110 号

THE SELECTED POEMS OF TOMAZ SALAMUN

TOMAZ SALAMUN

Copyright © TOMAZ SALAMUN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李倩倩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十亿个流浪汉, 或者虚无: 托马斯·萨拉蒙诗选

SHIYI GE LIULANGHAN, HUOZHE XUWU; TUOMASI · SALAMENG SHI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125 2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十亿个流浪汉，或者虚无

记忆， 阅读， 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式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作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

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

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他是他自己的上帝

(中译本前言)

高兴

陆陆续续译过一些萨拉蒙诗作，为唐晓渡、西川主编的《当代国际诗坛》，为吉狄马加创办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为北岛主持的香港之夜诗歌节，但都属于客串性质，依据的也都是些零星的资料。去年春天，在广州，同诗人黄礼孩相聚。礼孩说他决定将第七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授予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当我将这一消息告诉萨拉蒙时，他的欣喜溢于言表：“亲爱的高兴，获知这一消息，我的心里充满自豪、感动和幸福之情。你的名字真好，你的作用就是在世上传播幸福。可惜，我一点都不懂中文，但所有中国作家都说你翻译我，翻译其他诗人，都十分出色，有力。我怀着谦卑之心，欣然接受你们的负有盛名的

奖项。托马斯^①是我的老朋友。我也十分珍惜欧金尼奥·安德拉德的作品。你将要翻译我的诗集，这让我的心智都感到温暖。请代我向黄礼孩先生表达我的欣喜之情和诚挚问候。”

为配合颁奖，需要翻译出版一本萨拉蒙诗选。此诗选先由礼孩以民间方式出版，然后再加以扩充，交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得知这一出版计划，萨拉蒙十分开心，甚至有点激动，迅速快递给我他的四本诗集，以及翻译和出版授权书。手捧着他题赠的诗集，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仿佛正透过镜片望着我，笑盈盈的样子，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所说的那种“天使般的微笑”。

于是，就在这“天使般的微笑”的注视下，几乎在京城最为闷热难耐的时刻，在大雨的悬念中和阴影下，我又一次开始翻译托马斯·萨拉蒙。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却由衷向往。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是一个典型。他对小国这一概念特别敏感。在他看来，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昆德拉如此。萨拉蒙亦如此。了解一下萨拉蒙的人生简历和诗歌道路，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小国诗人是如何成为“世界性的人”的。

托马斯·萨拉蒙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出生于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市，成长于科佩尔小镇。科佩尔位于亚得里亚海滨城市的里雅斯特南部，历史上曾长期属于威尼斯管辖，一度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两

^① 指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曾获得过“诗歌与人·诗人奖”。

次世界大战之间，又回归意大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科佩尔小镇仅有一万五千人口，大多数居民讲意大利语，小镇当时由南斯拉夫军队管理。一九五四年后，归入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九六〇年，萨拉蒙进入卢布尔雅那大学，攻读历史和艺术史专业。他自己坦承，那时，他“是一个迷茫而纯真的年轻男子，渴望在这世上留下印记，但更主要的是，渴望自由。只是稍稍被兰波、杜甫、索福克勒斯和惠特曼所打动。确实，当一位有力的斯洛文尼亚诗人丹内·扎奇克出现在我们的研讨会上，朗诵起他的备受折磨、伤痕累累的诗篇时，一丝小小的感染爆炸了。一场大火，一道我们崇高而古老的行当的火柱，燃烧着我，诱惑着我，定义着我。相对于行当，那更是一种命运”。从此之后，萨拉蒙便踏上了诗歌之路。

但在那特殊的年代，踏上诗歌之路，也就意味着踏上一条危险之路。果然，一九六四年，他在编辑文学杂志时，因发表“出格作品”，引起当局不满，曾被关押五天。阴差阳错，他却因此成为某种文化英雄，受到斯洛文尼亚文化界的瞩目。一九六五年，他获得艺术史硕士学位，并于翌年，以地下方式出版处女诗集《扑克》。人们普遍认为，这部诗集，凭借其荒诞性、游戏性，以及反叛色彩，成为战后斯洛文尼亚现代诗歌的肇始。之后，他又先后赴意大利和巴黎进修艺术史。回到卢布尔雅那后，曾担任现代美术馆馆长助理。从一九六九年，他开始以环境艺术家和观念艺术家的身份在南斯拉夫各地举办巡回画展。一九七〇年夏天，他来到美国纽约参加国际画展。接着，又回到卢布尔雅那，并在美术学院讲授二十世纪艺术。一年后，应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再度来到美国，一下子待了两年。正是在那里，萨拉蒙开始广泛阅读和接触美国诗人。也正是在那里，他同衣阿华诗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两部英文版诗集《涡轮机》（1973）和《雪》（1974）。事实上，这两本诗集出版时，萨拉蒙已又一次回到卢布尔雅那，做过一些奇怪的行当：写诗的同时，翻译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阿波利奈尔、巴尔扎克和西蒙·波伏瓦，在乡村小学

教过书，还当过推销员。一九七九年，他获得资助，得以前往墨西哥工作和生活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诗歌写作，不断地有新作问世。进入八十年代，他的诗歌写作节奏有所放慢，诗歌中的基调也日趋阴暗。而随着他的诗歌被译成英语、德语、波兰语等语言，他开始为国际诗坛所瞩目。

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和回归，“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这种自觉的追求，极大地丰富了萨拉蒙的阅历和视野。他也因此渐渐成为一个具有宇宙意识和全球目光的诗人。

在介绍东欧文学时，我曾说过：“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学的两个关键词。”萨拉蒙无疑是个东欧诗人，而且是个典型的东欧诗人。同时，当你阅读他的诗歌，当你了解了他的经历和视野，当你看到他流畅地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同别国诗人交流，你会清楚地意识到，他绝对又是个世界性的诗人。不难看出，影响和交融，也是他人生履历和诗歌写作的两个关键词。在评析萨拉蒙诗歌时，罗伯特·哈斯认为，兰波、洛特雷阿蒙、惠特曼、赫列博尼科夫，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俄国未来主义、美国纽约派诗歌等等诗人和诗歌流派，都曾对萨拉蒙的诗歌写作产生过影响。除去影响和交融，我们也千万不能忽视他的成长和生活背景：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某种程度上，这种特殊的现实，为萨拉蒙，也为东欧其他作家，提供了特殊的创作土壤。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交融和背景中，萨拉蒙确立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指纹：

托马斯·萨拉蒙是头怪兽。

托马斯·萨拉蒙是个空中掠过的球体。

他在暮色中躺下，他在暮色中游泳。

人们和我，望着他，目瞪口呆，

我们愿他一切如意，兴许他是颗彗星。

兴许他是诸神的惩戒，

世界的界石。
兴许他是宇宙中一粒特别的微尘，
将给星球提供能源，
当石油、钢铁和粮食短缺的时候。
他或许只是个驼子，他的头
该像蜘蛛头那样被砍掉。
但那时，某种东西将会吮吸
托马斯·萨拉蒙，也许是他的头。
也许他该被夹在玻璃
之中，他的照片该被拍摄。
也许他该被泡在甲醛中，这样，孩子们
就能看他，像看胎儿、蛋白
和美人鱼一般。
来年，他也许将在夏威夷
或卢布尔雅那。看门人将倒卖
门票。那里，人们赤足
走向大学。浪涛能达到
百英尺之高。城市美妙无比，
挤满了不断增长的人群，
微风柔和。
但在卢布尔雅那，人们说：瞧！
这就是托马斯·萨拉蒙，他同
妻子玛茹什卡到店里买了点牛奶。
他将饮下那牛奶，而这就是历史。

——《历史》

诗人萨拉蒙笔下的历史，显然不是统治者的历史，而是个体的历

史，而是诗人的历史，而是具体生存的历史，而是颠覆者的历史。诗人就该是独立的，不羁的，反叛的，像头“怪兽”，与众不同，而又充满人性、自信和能量。诗人就该成为历史的主角。诗人就这样登上了人生和世界舞台。可以想象，这样的定位和形象，对当时的斯洛文尼亚诗坛会构成怎样的破坏力和冲击力，同时，又具有怎样的建设意义。

破碎，即兴，随心所欲，丰沛的奇想，和强烈的反叛，有时又充满了反讽色彩，荒诞意识，和自我神话倾向，而所有这些又让他的诗歌流露出神秘的气息。诗歌中的萨拉蒙时而愤怒，时而忧伤，时而幽默，时而深情，时而陷于沉思和幻想，时而热衷于冷嘲热讽，时而站立于大地，时而升上太空，时而舒展想象的翅膀，时而又如孩童般在同语言和意象游戏。但不管怎样，他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坚硬的质地：

……我笑个不停，

或者忧伤，如一只猴子。

其实，我是这样的一块地中海岩石，

你甚至可以在我身上烤肉排。

——《我在阅读，关于博尔赫斯……》

他是个艺术幻想家，又是个语言实验者。他注重诗歌艺术，但又时刻没有偏离生活现实。在诗歌王国中，他豪放不羁，傲慢无礼，鄙视一切成规，沉浸于实验和创新，同时也没忘记社会担当和道德义务。在介绍斯洛文尼亚人时，萨拉蒙说：“斯洛文尼亚人从来都中规中矩。”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也像他的同胞那样中规中矩。在同他的通信交往中，我发现他总是那么的温和、儒雅，周到，彬彬有礼，富